

我眼中的特奥运动员

尹月

我作为一名特奥志愿者，在为期五天的走进社区活动中，和四名西班牙特奥运动员以及他们的教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马丁总把大红外套系在腰间，咧开大嘴无忧无虑地嬉笑玩耍；埃度沉稳憨直，藏在DV后面四处拍摄，从不放过一个细节。而当镜头对准他时，高大的埃度会像小男孩一般腼腆羞涩地低头微笑。约尔第被我们戏称为“文静的人”，因为他很少说话，总挂着高深莫测的表情远远站在一边观望。但他极富运动天赋：乒乓、足球、网球样样拿手。运动场上的约尔第不复“文静”本色，做鬼脸、随着音乐扭动身体，常常不等我们予以关注，自己就先笑倒了。胖胖的留着小胡子的荷西是五人制足球的总教练，他深邃的黑眼睛、优雅的手势中蕴藏着对队员们无比的慈爱 and 包容。他的队员们喜爱他又尊敬他，他们相处得像家人一样亲密无间。

费南多是我接触最多、相处最融洽的运动员。他爱说爱笑、歌声不绝，又文质彬彬，充满绅士风度。他爱面子：做互动游戏时碰到自己擅长的项目就踊跃展示并获优胜（用筷子夹乒乓球），而到了模仿新疆舞、太极剑等环节就说什么也不肯上台；他会在合影时突然长身挡住后面的人，在大家一片“哦，费南多！”的“谴责”声中开怀大笑；他会摸着自己光秃秃的前额追忆从前满头金发的美好时光；他会卖力并以惊人的速度跟我学中文甚至日文，然后得意洋洋地教他的同伴们，反复纠正他们的发音；他会满怀深情地说起故乡巴塞罗那，那里有他的妈妈、弟妹、蓝眼睛的小侄子、漂亮的女朋友……

我们凝视着彼此的眼睛微笑、叫着名字、打手势、翻字典，用尽一切方法交流。几天来，我说了无数遍“谢谢”、“不用谢”、“早上好”、“你好吗？”、“累不累？”最基本的问候却让融融的关爱在我们当中流淌。我看到埃度跪在地上为一个小运动员系鞋带；我看到团长戴维斯每天早晨跟他的团员们一个一个地打招呼，他们的友爱和相互扶持让我动容。我看着他们在运动场上挥汗如雨、活跃敏捷；看着他们下赢五子棋时狡黠的眼神；看着他们仔细观看我们赠送的礼物，然后用拥抱和亲吻表示喜欢和感谢；看着他们在拍集体照时挥舞国旗呼喊祖国名字。

我不愿说“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”这样的话了，因为作为一名普通志愿者，我只是尽着分内的一点责任，却收获了运动员们最有力的支持、最热烈的回应和最真诚的感谢。我不知道他们付出了怎样的艰辛才能成为这样优秀的特奥运动员；不知道他们葆有怎样的勇敢和真诚才能这样开开心心地生活、拼搏。我只知道他们在蓝天和阳光下的身影带给我前所未有的快活和平静，我愿意与这样一群可爱的人携手同行。

写这些文字的时候，我的眼前闪现着一张张可亲的面庞，欢笑和歌声依然萦绕耳际，不断挥动的手臂还在声声道着珍重。下一批志愿者已经拿过我们的接力棒，延续着奉献带来的快乐和感恩。抱着费南多送的吉祥物“三毛”，我祝愿你们的人生幸福美满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们所给予的一切。

1941年10月的一天下午，天色昏沉，我和黄福林同志跟着新四军交通参谋张轩同志乘船离开上海，到解放区去。事前规定三人装成互不相识，以张参谋动向作为我俩行动目标。船离吴淞码头，经过敌人检查，通过伪化区，我们终于走进一个村落，穿过一些茅舍，在有草堆的场地上，看到肩挂驳壳枪或坐或立的战士，在一所瓦屋门口交谈。我们由战士们指引，走进门去，经过小天井，进了客堂。

阳光只穿射客堂的前半间，隐约地看到张参谋向一个干部立正敬礼，指指我俩讲了几句话，同时递上一张纸条，估计是我俩的组织介绍信，他又转过身向我俩挥手点头后走了。此后有两位领导干部走过来和我俩握手，邀我们坐在方桌边的一张长板凳上。他们都着灰布军装，一位两眼炯炯有神，一位笑容可掬。简略寒暄后，他们问起上海的情况。黄福林同志汇报了上海市场、敌伪动态、职工状况、地下党斗争形势。其间，他们偶有插话纠正或追问，听得很认真，直至开饭了，才派人把组织科长王坚同志请来，并嘱咐我们跟他一起行动，一切听他安排。

张之江先生是纵横上海滩半个多世纪的著名记者，是我的业师。

我从小看新民晚报，由喜爱京剧而爱读之江。改革开放后从部队文工团转业回沪，正值之江先生焕发第二次青春，我慕名做了他的门下客。后来据老束（束纫秋总编辑）告知，新民晚报复刊招聘时，我的那些京剧评论，成为被录用的主要依据。原来这些稿子多数是之江先生约的或转发的。

进晚报后，我与他对面而坐，一起分管戏曲线条。梨园谚语说“宁赠三亩田，不教一出戏”，显然，我在晚报成长得越快，对之江先生的“冲击”就越大。可是他毫不在意。有一次我新闻稿开头便是“日前……”他说：“不行，新闻时效已经落后。你应该以内容最引人注目处作为导语开头，扬长避短。”他经常这样具体指导，教我尽快掌握工作规律。我第一次拜见俞振飞和采访李炳淑，都是他领去的。1984年国庆节前夕，我随街头工人锣鼓队游行一圈，回来交特写《欢天喜地锣鼓声》，他读完样报后，一直笑眯眯的，比我还要高兴。

先生与我们共事时，已经过了花甲之年。有一次他到兰州参加全国杂技汇演，白天采访，晚上观摩、写稿，次日清晨电话传稿，天天如此。最后一

之江先生二三事

翁思再

天，上午抢发评奖结果，下午飞回上海，当晚出现在天蟾舞台，散场回家为次日版面撰写“昨夜好戏”，真可谓老当益壮，马不停蹄。

“昨夜好戏”是晚报文艺版的传统专栏。当年没有电视或电视普及、之江先生力图让读者通过他的文章“看戏”。一般读者需要了解剧情，对此之江先生往往不作正面叙述，而是在描绘演员表演的过程中，把故事带出来。对于剧中的人物臧否、表演鉴赏、主题分析、艺术评价，他都以一种轻松的文艺欣赏笔法，自然将其显示。这种写法可谓“之江体”。它是民间报纸的风格，迥异于党报和各类日报的文艺评论。张林岚副总编辑说“内行写给外行看”、李仲原组长说“寓评

于赏(析)，寓赏于介(绍)”，之江先生使这些“晚报格言”变得具体可感。新民报历来以戏曲行家众多而享誉新闻界。与吴祖光、陈白尘、马彦祥、唐大郎(云旌)、龚之方、吴承惠所不同的是，之江先生在文艺组(部)的时间最长，一辈子甘愿写“豆腐干”。他笔下的小文章日积月累，如今回首一看，竟是半个世纪上海舞台演出史的忠实记录。

之江先生乃钱塘世家，祖父是两代浙江督军的塾师，父亲张坚所书“楼外楼”匾至今悬挂在西湖之滨。先生少年求学之余，也曾随师学戏，粉墨登场，有《落马湖》黄天霸刷照为证。我听先生所津津乐道的，不仅在于同周信芳、盖叫天、魏莲芳、言慧珠交往的岁月，还在于他曾经做过政治记者。上世纪50年代伏罗希洛夫访华，报社派他跟踪采访，追到杭州。此时各报之正面报道俱已详尽，伏罗希洛夫游西湖记者均未能接近。之江先生乃于伏罗希洛夫下船后，找到掌舵的船工，与之闲聊，采访到船上各种花絮，次日以生动见报，大为增色。这个采访动作也是典型“晚报式”——“避重

正在我带着梦想和狐疑忙着想上新戏时，忽地《蜕变》前台票房小窗口被两条打着红方印的封条封了。大伙全愣了。

在后台，佐临说：“封了《蜕变》是我们的光荣。我们先垫一周《镀金》，然后再上新戏《边城故事》(又名《凤娃》)。”

《镀金》是上职的看家戏，韩非冷面滑稽，天才的喜剧表演令人忍俊不止，笑声掌声不断，每次演出上座都好。前台门口围着好多人不走。有的人说：“我不退票，我等着重演。”另一位说：“我也不退票，冷不丁封戏，剧团损失太大了。我支持你们。”黄先生带着我们全体演员到大门口表示谢意。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。

就轻”，“以小见大”“迂回战术”。此举之成功还在于他对杭州风物的熟悉，信手拈来，涉笔成趣。记得他最爱出差杭州，顺便游山玩水，饮茶聊天，这就难免招来“散漫”“爱玩”之讥。可是他我行我素，还对我说：好的文艺记者哪有不会“玩”的?玩的过程就是积累，还可能交到终身受益的真朋友。

有一件事，他在古稀之年才说出来——上世纪40年代，他是地下党外围的成员，写过许多倾向进步和光明的新闻作品，这些都有案可稽。后来共产党坐江山了，之江先生既不入党，也未谋官，一直快乐地保持着普通记者的身份。然而在古稀之年，中国社会出现信仰、信念、信任之“三信危机”关头，他却站出来申请入党了。我深知，先生是一位非常正直和独立的知识分子，年庚虽如锈蚀，心底却还燃烧着希望的火苗。

之江师九十大寿，适逢新民晚报强调文脉之际，特撰此文。

《蜕变》被查封

黄宗英

法国纪行

王万里

——

深夜上班机，秋风撩人衣。腾云穿雾去，天亮到巴黎。

二

路上行人稀，梧桐楼畔依。轿车小排量，铁塔似云梯。

晨八时许，驰入宁静的巴黎市中心，大街小巷两侧停放的轿车中八成是便捷省油的微型车，这与雄伟的艾菲尔铁塔相映成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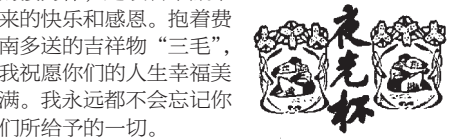
三

锈迹凯旋门，斑駁市政厅。香街弹路路，修旧不翻新。

四

大海碧如蓝，槐林立港湾。婷婷棕榈树，款款金沙灘。胶塑单车道，花园无障栏。税收均贫富，人老最安闲。

优美的环境，适宜的保障，使很多法国人选择在尼斯养老。



1941年10月的一天下午，天色昏沉，我和黄福林同志跟着新四军交通参谋张轩同志乘船离开上海，到解放区去。事前规定三人装成互不相识，以张参谋动向作为我俩行动目标。船离吴淞码头，经过敌人检查，通过伪化区，我们终于走进一个村落，穿过一些茅舍，在有草堆的场地上，看到肩挂驳壳枪或坐或立的战士，在一所瓦屋门口交谈。我们由战士们指引，走进门去，经过小天井，进了客堂。

阳光只穿射客堂的前半间，隐约地看到张参谋向一个干部立正敬礼，指指我俩讲了几句话，同时递上一张纸条，估计是我俩的组织介绍信，他又转过身向我俩挥手点头后走了。此后有两位领导干部走过来和我俩握手，邀我们坐在方桌边的一张长板凳上。他们都着灰布军装，一位两眼炯炯有神，一位笑容可掬。简略寒暄后，他们问起上海的情况。黄福林同志汇报了上海市场、敌伪动态、职工状况、地下党斗争形势。其间，他们偶有插话纠正或追问，听得很认真，直至开饭了，才派人把组织科长王坚同志请来，并嘱咐我们跟他一起行动，一切听他安排。

到了组织科，王科长向那里的干事们介绍了我俩的情况。当围坐一桌用午膳时，王科长问：“首长刚才对你们讲了些什么？”我们迷糊了，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就说：刚才接见你们的是谭震林师长兼政委和邓振南主任。我们听了既惊喜。对于谭震林同志，我们早知他是卓越的党和红军领导人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创建和发展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，皖南事变后，他被任命为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。

将军与新兵

张心宜

而邓主任，据事后了解，他是长征的英雄，又是久经锻炼的群众组织者，一直在敌、伪、顽夹击的江南主持工作。当天下午，刚和我们见过一面的谭师长就来看望我们了。那时我俩正坐在组织科住宅前的打谷场上看文件，这是在上海看不到的。谭师长来了，他像是见老朋友一样，问我们休息好没有，并要我们在村庄里走走，看看战士们和农民们生活状况……。他那样的随和、诚挚，其亲切之情感人肺腑。

傍晚，队伍出发了，村里的农民和孩子有的跟着，有的招手，流

露了对人民子弟兵的留恋之情。夜幕在四野张开，漫长的队伍中，没有人讲话，没有人抽烟，天空星星在闪烁，路上前面人影幢幢，我们紧跟着部队行进，顺利地到达了新的宿营地，住进了已安排好的房子。通讯员忙着为我们烧洗脚水，借门搭搭铺。这夜我们睡得极熟，一觉醒来，天色早白。早起的同志们正在学习，看到我们醒来，纷纷道辛苦。下午约三点钟辰光，谭师长派警卫员来叫我到他那里。到时，他正在读毛主席著作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。等我坐定，他就向我交代我和黄福林的任务是到军工厂工作。除简略介绍军工厂现状及任务外，他着重说明自力更生生产军火，对抗战胜利的重要作用，科学技术对军事工作和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性。他同时指着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这本书，问我读过没有?并不等我回答，又谆谆告诫我，要多读毛主席著作，在实践中加深理解，并鼓励我们安心工作，艰苦奋斗；指出抗战是一定会胜利的，时间也不会太久。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，使我们得到鼓舞，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心。

从童工到战士，他在战斗中成长。

尽管此事正史无明载，只有口传，但民间传说即使有点创作成分，也总是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心声。

还是让我们去品尝那香甜可口的杜甫枣吧，它才是最好的见证。

以前我读古人物画，感觉虽有一种往深沉里扭的笔墨之美，但鲜活的生活场景却并不多见。这说明，古人与当代人画国画人物是用两种完全不同的视野创作的。看了任耀义的国画人物，更明白当代画家画中国画与古人其实是两码事。

有着良好的素描功底和色彩灵性，任耀义画国画游刃有余。“我画国画人物最凸现的是生活的精美，人物在画面中神采飞扬，加之衬景，一幅人物画有了长卷舒展不尽的灵性。”我们看任耀义的人物在画面中都是占尽画面，如同国外的电影是以凸现人物为主，人的色彩十分灿烂，而且笔力随着其情飞扬，色彩十分爽丽，这样人物在画面中不见孤单，用当代话是互动的，美姿顾盼。任耀义在展现他的一幅丈二匹的长卷人物时，人物各尽其态，其



小憩 (中国画) 任耀义

姿各展其美，其美各显神韵，真是接少女无尽美，映盼神韵别样情。所以刘勰在“文心雕龙”中注重创作的情采合一，这样画面就会燕舞飞花，声情并茂，有雕龙之感。

可见任耀义画中国画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论诗的创作时贵“境界”之营造，过去的中国画太静，杏花枝头春意闹，任耀义的中国画贵一“闹”字，将国画的笔力修养与色彩的生姿和生活之趣结合，任耀义说：“我画人物费时多年在素描上下工夫，这为我日后开拓人物题材打造了良好基础。”生活的积累和艺术的畅想本是互动的，一位国画家经常在人物创作中引发自然的灵感，其作品随着题材的深广就不受笔墨的束缚了。这也是任耀义的国画所以随时而新，随彩而灵的真谛所在。

